

We Share Walls: Language, Land, and Gender in Berber Morocco.

Katherine E. Hoffma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261pp.

劉子愷 伊利諾大學人類學系

從書寫角度而言，這是一本資料翔實與深度描繪兼具的語言人類學民族誌。作者是位語言人類學家暨文化人類學家。除了第五部分有關於廣播電臺語言的研究為新增的章節外，本書主要內容來自她的博士論文。作者從實踐理論與語言意識形態 (ideologies of language) 觀點為出發，敘述住在摩洛哥西南，慣於使用 Tamazight 方言群 Tashelhit 語與 Tamazight 語的 Berber 人，口語表述文化與文類 (oral expressive culture and genre) 在日常生活裡的實踐過程。作者認為：(1) 該文化受到以阿拉伯語為主流的政治經濟活動、大眾文化、教育與國家土地政策、人口遷徙等因素的影響，而逐漸被邊緣化。這個邊緣化過程所造成不同價值觀間的對立與衝突，以及語言意識形態的變遷，都清楚地呈現在 Berber 人的表述文化實踐行動中。(2) Berber 人的口語表述文化與文類實踐又與其對農村女性和地域之論述與想像緊密關連。本書並非侷限於討論表述文化、語言意識形態、地域、性別間辯證關係的著作，亦非僅專注於以語料為主的語言形式分析；而是承襲近年來語言人類學家所提倡的：延續以「談話」(talk) 為主 (Goodwin 1990; Schieffelin 1990) 的語言人類學研究傳統，但跳脫單一話語情境或單一話語群的語言使用，而將「談話」放在政治經濟的格局中思考 (Gal 1989; Irvine 1989) 之研究。

全書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作者首先解釋本書標題「我們共用界限」意涵。此標題乃依照當地習慣以第一人稱的複數稱謂來說明 Berber 人常以農作比擬他們語言文化的認同。也就是說，個人在各自的土地上耕作，但彼此間仍共享水源、共用農田間的界線。Berber 語言文化認同機制就像是彼此界線的共享 / 區隔，該機制不但涉及地域概念的論述，同時與城鄉人口流動、新國家政策等外來語言文化介入的影響有緊密的關連。第二章論及其以日常生活和表述文化為主題的研究方法，以及其田野地點：摩洛哥西南山區農村、平地農村與鄰

近城鎮。作者的民族誌以過去式書寫，用意在強調Berber人的語言文化認同正不斷經歷社會變遷，移居城鎮人口逐年增加的影響；而以阿拉伯語為主要的教育體制，更造成Berber語言文化逐漸地往阿拉伯化方向之推移。

第二部分標題以「不和諧音」一詞比擬性別論述，討論本書的核心議題——「真實性的性別」(the gender of authenticity)。此部分完整精闢地展現了本書的民族誌資料分析與理論，不但顯示作者在田野調查、語言分析與書寫上的傑出能力，也為後續篇章之開展做了鋪陳。作者認為Tashelhit語用與表述文化在語言變遷影響下，逐漸地女性化、農村地域化。擅長於使用Tashelhit語者往往與只講單語的農村婦女劃上等號；而單語能力正是限制農村婦女離開農村、參與城市打工機會、改變她們邊緣化社會位階可能性的門檻。同時，作者將語言變遷與語言意識形態議題放在人與物在城市／農村間流動遷徙架構下，討論外出打工年輕男性在返鄉停留的短暫日子裡，與住在原鄉未婚或已婚女性交談、互動、唱歌聚會的過程，以凸顯Tashelhit表述文化不僅是農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環，也成為遷徙到城市工作的Tashelhit人日常生活中論述、思念「農村和家鄉」(*tamazirt*)的重要基礎。

第三部分有兩章，敘述在摩洛哥西南山區外移人口與留住農村人口如何談論或表述對「農村和家鄉」的概念，並比較其間之差異。作者以「諧和音」一詞作為章節標題比擬當地人論述家鄉的方式。前一章強調農村婦女的角色與家鄉的意象關係。在農村，一方面因男人外出打工，婦女需負擔大部分勞力密集的農耕工作；另一方面，她們必須擔負語言社會化過程的責任，教導下一代熟悉當地表述文化，而年長農村婦女也往往需要教導剛結婚的婦女如何與婆婆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的角色。後一章藉分析不同性別對農村和家鄉的論述與想像，包括農村婦女在結婚儀式唱的*tizrrarin*歌、外出打工男人回鄉聚會時唱的*tand-damt*歌以及日常交談方式等。對農村婦女來說，「農村和家鄉」代表土地、社區認同、價值觀；對男人來說，「農村和家鄉」是一個在社會變遷下令人遐想懷舊的地方，也是一個本地／外來文化語言價值觀對立衝突之處。

第四部分也有兩章，談的是住在Sous河谷平地的Ishelhin人。他們多會講包括Tashelhit語和阿拉伯語在內的兩種語言，然而山區農村講Tashelhit語的人不認為他們是講正統Tashelhit語的人，而是阿拉伯人；也認為他們的唱歌跳舞等口語表述文化是不純正的，內容充滿雙語共用的情形。作者特以「對

唱」一詞作為第四部分標題，比擬雙語共用的文化內涵。作者討論一位阿拉伯女人嫁給 Ashelhit 人的日子。參加婚禮的男方親友與女方親友間使用不同歌唱文類，以及彼此間使用雙語之交談。透過此例，作者批判既有雙語轉換 (code-switching) 的研究，認為在同一表述行動裡發生雙語互換情形，不能簡單地就個人抉擇哪種語言適用的角度，或是單從外來語言在殖民歷史下被置入本地語言而發生的共用現象來解釋。她主張 Ashelhit 表述文化的實踐，展現的是非固定、依情境需要，且能變動性的使用某種文類或以某種雙語互換形式的說法。雖然，在理論分析架構上，作者似乎頗具說服力的運用 Ashelhit 田野資料，提供不同於現有社會語言學中關於語言變遷、文類、雙語互換共存的討論，但筆者以為這部分的討論，反而是整本書田野資料最薄弱而不足之處。尤其在作者論及 Sous 河谷平地共處在同一政經背景中的 Ishelhin 人和阿拉伯人，彼此語言文化雖然互為影響，但 Ishelhin 語言文化明顯被邊緣化的論點下，作者在書寫上卻仍偏向以大環境政治經濟背景的陳述，而少見採用人與人間語言互動交談方式之分析呈現其論證的做法，似乎違背了她在本書中強調研究表述文化為書寫重點之初衷。

第五部分，講述當地創立以 Tashelhit 語為主的電臺節目的歷史與政治經濟背景，以及其引發何謂純正的 Tashelhit 語，何謂正確的 Tashelhit 發音論述之討論。純正語言意識形態的論述，不僅出現在電臺節目製作上，也在講 Tashelhit 語的方言群間形成自我批判的風潮，他們開始討論誰使用的 Tashelhit 語是最純正的。作者成功地藉文本分析討論當地的電臺廣播如何以農業符號與表述文化為主，宣傳 Tashelhit 農村概念，並成為一種專用語域 (register) 的過程。較可惜的是，作者關於語言意識形態純正性的討論，似乎與本書針對性別與表述文化的討論脫節，而理論與資料的對話也似乎停留在談電臺語言的政治經濟面以及農村婦女收聽電臺之經驗，而非電臺語言如何呈現農村意象下的性別角色。

筆者認為本書最成功之處有二：一是作者遵循 1980 年代以來人類學界對民族誌書寫文化批判之思潮，清楚地交代她身為一個未婚的外來女性研究者涉入當地表述文化，記錄參與觀察當地語言使用情形與性別互動之過程；並說明 Berber 人所認知的語言意識形態。相較於日常生活交談內容，Berber 人認為老人傳頌的古詩歌是最佳的語言知識，最值得被翔實錄音記錄下來。他們並不希

望日常生活交談內容被錄音記錄下來。其次是，作者以日常生活交談 (everyday talk)、對唱活動、話語 (speech)、傳唱古詩 (sung poetry) 為切入點，描述不同年齡與不同社會背景的農村女性、外出打工男性、城市居民以及社會菁英，如何理解、想像、參與當地表述文化；如何談論 Tamazight 語言變遷以及多語 (在當地使用的外來語包括摩洛哥阿拉伯語、古阿拉伯語、法語) 接觸情況。通過這些材料的鋪陳，作者成功地論證農村表述文化之實踐與性別界線論述間的密切相關性。從移居城市打工的農村男性角度而言，相較於城市的多語言多文化混雜的環境，Berber 農村婦女的表述文化常被理解為具原鄉真實特色，農村婦女語言和知識代表保留當地價值觀、語言的純正性，以及堅忍的人格特質。

本書作為「論述與文化」此一叢書的第二本，作者清楚呼應以「談話」為主的語言人類民族誌研究，強調語言與文化的互動過程，該過程所涉及的語言符號使用與意識形態的再現。更具體的說，本書可放在從 1980 年末期到 1990 年代起，在語言人類學界所興起針對語言意識形態的討論。但誠如 Duranti (2003) 回顧美國語言人類學發展史的文章裡所評論的，語言意識形態的概念不過是提供研究語言的一種角度，不是一項新的理論突破。既有以語言意識形態為主的研究往往是其他文化人類家已大量研究過的課題。從此一角度來看，本書似乎也凸顯語言意識形態研究上的瓶頸。當作者主張政治勢力和經濟活動實質影響人們對使用 Tashelhit 語產生不同想法，企圖為語言意識形態研究提供較大的格局時，作者似乎仍停留在民族誌上的描述，並沒能回歸到語言人類學家關於語言與政治經濟的理論討論，或是文化人類學家關於經濟遷徙活動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討論。當作者談國家土地租賃的政策讓 Berber 人與阿拉伯人間有更緊密的經濟互動，產生語言變遷和雙語共用的情形，而主張這是族群關係也是語言關係，這樣的推論似乎太過簡單，無法提供理論上的對話。筆者認為倘若作者能回歸到她在本書第二部分提出的衍生文化 (metaculture) 概念，進一步回答是否 Berber 人表述文化實踐能提供一不同於現有關於語言與政治經濟課題研究的思維方式，將有可能提供一較為創新的理論方向來思考語言意識形態、社會不均與遷徙關係間的議題。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本書對語言人類學研究方法和書寫文化之批判與反思，將提供語言人類學、口語傳播、社會語言學等課程授課絕佳的討論題材。

筆者推薦此書給有興趣於研究語言意識形態與口語表述文化、性別與社會變遷、地域論述、電臺語言等議題之研究者。

參考書目

Duranti, Alessandro

- 2003 Language as Culture in U.S. Anthropology: Three Paradigms. *Current Anthropology* 44 (3): 323-347.

Gal, Susan

- 1989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345-367.

Goodwin, Marjorie H.

- 1990 *He-Said-She-Said: Talk as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Black Childr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rvine, Judith

- 1989 When Talk Isn't Cheap: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Ethnologist* 16: 248-267.

Schieffelin, Bambi B.

- 1990 *The Give and Take of Everyday Life: Language Socialization of Kaluli Childr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